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一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陳國弟　陳建明
責任校對:石大明
封面設計:文小牛
責任印制:吴雨時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 / 郭齊, 李文澤主編.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5.5
ISBN 7-5614-3051-5

Ⅰ.儒…　Ⅱ.①郭…　②李…　Ⅲ.①儒家②孔丘(前551～前479)-研究③孟軻(前390～前305)-研究　Ⅳ.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038116號

書名　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

主編　郭　齊　李文澤
出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24號(610065)
發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印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張　562.25
字數　7330千字
版次　2005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1～150套
定價　7150.00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系。電話: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寄回出版社調換。
◆網址:www.scupress.com.cn

儒藏總序

《儒藏》是收集保存儒學文獻的大型叢書。她薈萃二千餘年儒學著作，以系統的著録體例，分門别類地予以標點、校勘和編排。她作爲中國古代儒學成就之集成，可望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徵，與《大藏經》、《道藏》鼎足而三，永遠滋養中華民族的心靈。今值《儒藏》出版之際，聊述因緣，以弁篇首。

一

儒學是中國的。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國的孔子集虞、夏、商、周優秀文化之大成，總《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樹「仁義」「誠信」之高標，垂「中庸」「忠恕」之宏法，創立儒學，垂教萬世。儒學生於斯，長於斯，昌盛於斯，亦曾一度衰微於斯。兩千多年來，儒學是引導中國文化走向輝煌的指南北斗，是鑄造中國文化特質的規矩準繩。她是中國文化之門、中國文化之蘊，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方面都産生了重大影響，促成了中國人特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形成。她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和靈

魂。在國際範圍内，人們一提起中國文化，首先想到的無疑就是孔子，就是他所創立的儒學。儒學是中國的，中國也是儒學的。要深入研究中國文化，欲準確地瞭解中國歷史，不認識孔夫子，不研究儒學，就不能得其門而入。

儒學是東方的。古代東方，北起朝鮮半島，東至日本列島，南到印支半島、南亞諸國，伴隨着儒家「偃武修文」、「睦近徠遠」外交方略的實施，東亞各國「成鈞館」（朝鮮）、「大學寮」（日本）、「國子監」和「國學院」（越南）等文教機構的設置，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儒學早已融入東方社會，成爲東方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共同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念的重要部分；東方各國的政治家、思想家，或用儒學治世，或以著書明理，與中華學人一道共同豐富和發展了儒學的理論和思想。因此國際「漢學界」在討論東方社會時，無不異口同聲地稱之爲「儒家文化圈」。

儒學又是世界的。作爲「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的文化主流，儒學不僅影響了東方，而且也輻射於世界。就古代而言，先秦儒學是西方學者公認的世界文化「軸心時代」的主流思想，是古代東方思想文化的源頭活水。儒學是開放性的。在歷史發展演進的長河中，儒學不斷以其「海納百川」、「集雜爲醇」的包容精神，融合含攝了各種外來文化與文明，與時並進，日新其德，使思想之源長盛，學術之樹常青。儒學在歷史上不斷兼容並包各家學術進行自我創新的歷史，是中國文化生生不息充滿創造活力的歷史，是人類文化寶庫日新月異不斷豐富的歷史，也是儒學不斷影響和輻射世界的歷史。她的經典和理論曾西涉流沙，遠渡重洋，對近代思想啟蒙和現代文明的形成産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在當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她又作爲十三億中國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和數千萬海外華人和僑胞共同的文化背景，卓爾屹立於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倡導「以和爲貴」、「和而不同」的和平共處哲學，以其「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精神，化解各種矛盾、調停地區衝突。

儒學是歷史的。在儒術「獨尊」的時代，儒學不僅是中國古代的學術，而且也幾乎是中國學術的古代，她與古代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結下了不解之緣。殷墟甲骨文有「儒」與「丘儒」之官，《周禮》有「師儒」之職，儒者在殷商時期就已發揮着重要作用。至春秋時期，孔子正式創立儒家學派，孔門弟子散遊四方，「六藝」之學風行天下，開啓了春秋戰國時期士人的智慧，催生了諸子學派，促成了百家爭鳴。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儒學就沒有周秦學術。繼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典教育與研究影響了中國兩千餘年的教育、選舉和文化。可以說，中國的古代史主要就是儒學影響中國的歷史。沒有儒學便沒有古代中國的教育，也就沒有古代中國的學術，也就不會有燦爛的中國文化。人類不可能生活在沒有歷史的真空之中，對於逝去的昨天，對於先賢的遺産，我們應該以回顧、反觀、總結與傳承的姿態，在歷史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用富有民族特色的創新來豐富歷史、美化生活。作爲與中國歷史水乳交融的儒學，當然不能游離於歷史繼承之外。

儒學又是現實的。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中國是文明古國，她的「古」不僅在於歷史上曾經有過，而更在於其歷史傳統一直在延續着，其優秀文化一直在弘揚和發展着。由殷可以見夏，由周可以觀殷。

後世之「繼周者」，有秦、有漢、有晉、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其民族則有華夏、有「四裔」，有漢族、有少數民族。然而，祇要是在華夏文化圈內崛起，祇要是在中華大地上立國，無論願意不願意，主動或被動，都必然打上儒學文化的烙印。綜觀古今歷史，無一例外。即使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也必將被中原固有文化所融合。如果說，在春秋戰國時期還存在「以夏變夷」和「以夷變夏」的爭論，那麼自秦漢以後的中國，無論誰來當皇帝坐天下，就毫無例外地是以「華化」「漢化」爲主流的多民族融合。「五胡十六國」是這樣，遼、金是這樣，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不例外，滿族建立的清朝更是如此。其原因也許有多種多樣，但其中以儒學爲主體的華夏文化代表了當時的先進文化，代表了各族文化發展的共同方向，則是最深層的原因。特別是儒家從理論上將這一文化總結出來，建立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體系，形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隋、唐等「正統」觀念，並從教育上、實踐上宣傳和推廣開來，從而形成了以儒學爲核心的華夏文明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儘管有些觀念在今天已顯得陳腐和落後，但它是千百年來維繫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的精神力量，更是激起「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豪情的潛在動力。今天，即使我們已經跨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瞬息萬變、不可捉摸的世界局勢，曾使傳統文化被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社會和多元化（甚至詭異化）的思想所困厄，以致於一些人曾一度產生過擺脫文化傳統「束縛」的想法。然而事實反復證明，文化傳統是無法擺脫的，儒學對新世紀、新世界的作用和影響仍然是不可低估、不容忽視的。她已呈現出與日俱增、歷久彌新之勢。隨着中國的和平崛起、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

也將煥然一新，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既有的價值觀念正在得到重新審視，儒學這一古老學科必將煥發出壯麗的青春，儒家思想也將一如既往地作用於當今的世界。否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一百餘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討論「面向二十一世紀」問題時，怎會發出「人類要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的呼聲！二零零四年八月，來自世界各地的二百餘位專家學者齊集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召開「第一屆儒學國際研討會」，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專家學者深入討論了儒學各類理念後，形成了《吉隆坡宣言》，宣稱儒家「『忠恕之道』是促進世界和平、物我相諧的基石」，提議「正式啟動『以儒學救世』的機運，締造二十一世紀儒學另一個國際化的新局面」！

儒學是理論的。儒家是一個陣容龐大的學術集群，儒學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思想體系，她集哲學、政治、倫理、社會、教育以及其他文化思想觀念爲一體，是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易大傳》）的命題，構成了中國人的宇宙模式和世界觀。「過猶不及」、「中正」「中庸」（孔子）的辯證思維，形成了中國人高超的思維方式和處世哲學。「仁義禮智信」（孔子、孟子、董仲舒）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國人作「新民」、立「新德」（《大學》）的指導思想。追求和平、講究秩序的理論，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社會、實現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載舟覆舟」（孔子）的君民關係論和「民貴君輕」（孟子）的「民本」思想，成了歷代志士仁人反對專制集權、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荀子）、「內聖外王」（莊子）的修身模式，構成了中國人終身嚮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孔子)的「忠恕」之道，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人際關係的無尚法寶。這一切的一切，都經儒家的提倡、推廣，逐漸融入了中國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撐着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繁衍，創造和豐富着自己燦爛的文化和文明。儒家經典是中國思想的源頭活水，儒家理論是中華精神的思想寶庫。我們衹要不願重過「從人到猿」的生活，當然就不會拒絶這份珍貴遺産的滋潤。

儒學尤其是實踐的。儒學是修身之學、實踐之學，倫理道德學說構成了儒家學說的核心和靈魂。儒家重視思想教育，注重個性修養和道德情操，提倡「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以天下爲己任」，强調道德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它雖然上究「天人」之際，下探「心性」之微，形上無象，玄之又玄，但在講究「博學」、「慎思」的同時，又特别强調「篤行」。它的「仁」便是要「愛人」，「義」便是要行而得宜，「禮」本身就是行爲規範，「智」便是要知曉「仁義」之道而慎守弗失(孟子)，「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儒家非常重視「五倫」教育，將其定義爲人倫之始、政治之本。「五品」之教首倡於堯舜之《典》，「五教」之義復申於《左傳》、《孟子》，至《中庸》更將其奉爲「天下之達道」。在儒家看來，五倫不順，將倫理倒錯，人將不人；五教推行，則社會和諧，政治清明。儒家成功地將個人的品德修養與國家的治理安定緊密地結合起來，把道德主體的能動作用與社會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機地融爲一體，從而使道德規範的約束功能與知耻自覺的自律機制更好地相輔相成。《大學》之書將「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定義爲修「大道」、聞「大義」的「三綱領」、「八條目」，設爲儒者奉行不貳的大綱大法，更是儒家力行躬踐哲學的集中體現。儒學正是以其理

論與實踐結合，個體修養與群體利益結合、道德修養與政治事業結合的學術思想，形成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仁義道德」、「民胞物與」、「孝親敬老」、「崇德尊賢」、「誠實忠信」、「見義勇爲」、「文明理性」、「公平正直」等優秀品德，這是她有別於宗教神學的根本之處。

總之，儒學作爲歷經兩千五百餘年發展的系統理論，已成爲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産和財富。她既是中國的，也是東方的和世界的；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儘管儒學作爲古代的一種意識形態和文化體系，也存在不太適應現代社會的内容；特別是經兩千年間專制君主的利用與歪曲，她帶上了許多落後的成分。但是，我們無論是要認識中國，還是要研究世界；無論是要回顧歷史，還是要服務現實；無論是要探討理論，還是要躬行實踐，在古今中國學術中，儒學都位居首選，理當研究和弘揚。這就是她在歷經了無數風風雨雨、艱難磨煉之後，仍能像鳳凰涅槃一般不斷獲得新生的緣由所在。儒學在今天即使已經失去了從前「塞乎天地，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放諸四海而無不準」(曾參)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地位，但若要認真地研究和認識中國，特別是中國人面對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的局面，要參與全球文化對話，重建人類文明新秩序，我們檢點一下自己的文化庫存，並衡之古今中外的一切學術，除了以儒學爲主體的優秀傳統文化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選擇。

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特別是「西學東漸」大潮下導致的「中學」迷失，「疑古過勇」帶來的文化虛無主義，以致於「儒學在哪裏」、「儒學爲何物」、「儒學研究從何着手」之類不該存在的問題，在儒學誕生之地的中國卻成了嚴重「問題」。儒家著作或滅於劫灰，或毁於人禍，或流失於重洋之外。

其所存者，亦分散於群籍，雜廁於四部，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人們常常會感到：要研究孔子而不知孔子資料何在，欲研究儒學卻不見儒學文獻全貌，欲研究經學卻不知何經可信、何書可讀。至於在吸收儒學與經學研究現有一切成果的基礎上，作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研究，則大有無所措手足之感。究其原因，皆在於近百年儒學傳統的丟失，尤在於儒學迄今未有一部自己的文獻集成。要擺脫儒學研究的這一隔世感與陌生感，確立儒學的本位意識，認真搜集和整理儒學文獻，建構完備的儒學文獻庫，就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了。前人爲矯「心學」末流「束書不觀」之弊，而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今天要糾正「疑古」過勇造成的文化虛無之失，我們也不得不重申：「舍文獻無儒學」了。這就是我們提倡編纂大型儒學叢書——《儒藏》的原因所在。

二

在中國學術史上有所謂「三教九流」之稱，「三教」即儒、釋、道，「九流」即諸子百家。佛教的文獻已經有中外各種版別的《大藏經》收集，道教文獻也有古今諸本《道藏》彙錄，就連份量並不十分龐大的諸子著作，也有《百子全書》、《諸子集成》系列來結集。可是迄今爲止，作爲中國文化主幹的儒學，卻沒有像佛、道、諸子那樣，擁有自己的大型叢書。

通觀中國歷史，每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復興無不是伴隨着對前代文獻的全面搜集和整理出現的。《隋書·經籍志序》曰：「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歷史已經昭示，儒學的創立和戰國的學術繁榮是以孔子删訂《六經》爲契機；西漢的經學初成與文化復蘇是以「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政策的實施爲先導；東漢的經學與文學、史學的繁盛也是以西漢末年向、歆父子校書爲基礎。同樣，隋大業間廣泛的收書和初唐的整理圖籍，奠定了大唐文明的基石；北宋初廣泛的文獻整理，揭開了中國文化高峰時代「宋代文化」的序幕；清朝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等大型文獻修纂工程的實施，直接促成了以「乾嘉之學」爲代表的「清學」的形成。文獻是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的載體，資料更是從事一切科學研究的基礎，文獻學和史料學正是保障文獻、史料得以科學利用和有效推廣的「先行官」。儒學要在新世紀得到發展和復興，重返淑世濟人之路，對其以文獻爲載體的成果進行徹底清理和合理繼承，便是先決條件。可惜的是，大規模地搜集和整理儒學文獻，並編製成大型儒學叢書，歷史上雖屢有倡議，卻始終没能實現，甚至專門而系統的儒學文獻著録體系也未曾建立。這對於以儒立國、以儒治世的中國而言，無疑是莫大的遺憾。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説「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又在《孔子世家》説：「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莊子·天運篇》和《天道篇》也有孔子「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以爲文」和孔子「繙十二經以説」的記載。説明孔子是最早將儒家經典整理出來，形成「六經」或「十二經」概念的第一人。

漢代劉向、劉歆父子整理群書，編成《別録》、《七略》，《七略》是中國第一部目録學著作。班固據《七略》刪成《漢書·藝文志》，其中《六藝略》記儒家經部圖書（按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排列，附史書於《春秋》之後）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諸子略》的「儒家類」記《晏子》、《子思》、《曾子》以下至「劉向所序」、「揚雄所序」儒學諸子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兩類共有儒學文獻一百五十六種、三千九百五十九篇，已備儒學文獻經部、論部二體。但在整個《漢志》著録的「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中，儒學文獻祇佔一小部分。

三國、西晉有《中經簿》及《中經新簿》，創立了「四分」法。魏秘書郎鄭默始製《中經》，晉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群書」。荀氏創以甲、乙、丙、丁標目，甲部即後來的「經部」，著録與《漢志》六藝略相同；乙部即《漢志》的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即後來的「子部」；丙部即後之「史部」；丁部即《漢志》的詩賦略，亦即後來的「集部」。《隋書·經籍志》承之，並正式以經、史、子、集命名四部。此後，直至《四庫全書總目》，四分法作爲中國圖書分類的主流，成了古典目録分類的固定體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六分也好，四分也好，都是百科書目，不是專科目録，更不是儒學文獻的總目。

南北朝時期，道教已有陸修靜的《三洞經書目録》，佛教有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唐開元時期佛教又有《開元釋教録》，都創立了很好的專題文獻著録體系。就儒學的發展史和當時地位而言，不應在目録學上毫無建樹。《魏書·儒林傳》載孫惠蔚上疏：「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

《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並說「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這裏的《甲乙新錄》是一部目錄書，但是什麽樣的書目呢？由於「《隋志》略而不言」，學人或疑「其書名爲甲、乙，或是衹錄六藝、諸子，抑舉甲、乙以該丙、丁，皆不可知」（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三）。我們認爲，荀勖《中經新簿》以甲部紀六藝、小學，乙部紀諸子、兵書、術數。東晉李充雖已將其乙、丙互換，以乙部紀史書、丙部錄諸子，但當時南北隔絕，盧昶未必及時採納，此之「甲」、「乙」仍當是經、子兩類。孫惠蔚欲請「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與其一起修訂，其書的乙類所錄則有可能就是儒家諸子。依此考察，盧氏《甲乙新錄》也許就是當時的儒學目錄。至宋代，高似孫有《史略》、《子略》、《緯略》等專題書目，用以著錄史部、子部和讖緯類圖書。但當時仍無專題性儒學總目傳世。

真正較系統的儒學文獻專科目錄，是清初朱彝尊的《經義考》三百卷。《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說：「是編統考歷朝經義之目，初名《經義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後分例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因改今名。凡御注、勅撰一卷，易七十卷，書二十六卷，詩二十二卷，周禮十卷，儀禮八卷，禮記二十五卷，通禮四卷，樂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論語十一卷，孝經九卷，孟子六卷，爾雅二卷，羣經十三卷，四書八卷，逸經三卷，毖緯五卷，擬經十三卷，承師五卷，宣講、立學共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板、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家學、自述各一卷。其宣講、立學、家學、自述三卷，皆有錄無書，蓋撰輯未竟也。」朱目主要對經學文獻進行分類著錄，衹有少量篇幅涉及儒學的師承、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版、著錄、通說、家學和自述等內容，而且其中宣講、立學、

家學、自述四目則付闕如，並無著錄。《經義考》衹對經部文獻著錄較全，卻對儒學諸子（理論類）和儒學史料圖書注意不夠（或根本未曾涉獵）。因此，《經義考》儘管是一部有規模的儒學文獻總目，但還不是儒家著作的全錄，也未對儒學著作進行系統分類。

歷史上較大型的儒典叢刻有以下幾次：東漢的《熹平石經》，曹魏的《正始石經》，唐初的《五經正義》，中唐的《開成石經》，五代孟蜀的《蜀石經》，北宋形成的《十三經註疏》，清初的《通志堂經解》，清中後期的《皇清經解》和《續皇清經解》等。但是規模都較小，難成體系。《熹平石經》衹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經。《正始石經》衹有《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三經。《五經正義》由唐太宗下令孔穎達負責修撰，衹有五部：即《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禮記正義》。《開成石經》衹有十二種單刻：《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蜀石經》衹比開成《石經》多一種，即北宋補刻的《孟子》。《十三經註疏》也衹有十三部。以上叢刻各經收書都衹有一種，構不成系統的著錄體系。

清徐乾學和納蘭性德等人滙刻成當時最大的儒學叢書——《通志堂經解》，收宋、元、明經書注解一百四十六種，按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論語、四書、爾雅九類編刻，又稱《九經解》。繼此盛舉，阮元和王先謙先後主持編刻了正續《皇清經解》，共收清代經解類著作三百八十九種，規模已經不小，但兩套叢書都衹「以人之先後爲次序，不以書爲次序」（嚴傑《編刻皇清經解序》），所收圖書未曾分類。而且以上三部叢書都限於儒家經部著作（《皇清經解》間涉筆記

和別集），著錄範圍不廣，未將儒學文獻儘可能地收錄，不利於創建儒學文獻的分類體系。

缺乏嚴格科學的分類方法，這對於小型叢書來說倒也無妨，但是對於將容納數千近萬種圖書的《儒藏》來說，就絕不能引以爲法了。更何況上述幾種儒學叢書都僅限於經部文獻，儒學其他的理論著作、史料著作，都一概付之闕如，這樣的叢書當然不能擔當起完整地反映儒學全部成果，全面地展現儒學歷史，系統地收集和保存儒學文獻的重任，也不能爲讀者提供「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之方便。

儒學文獻既無大型叢書，又無系統著錄的狀況，在明代萬曆年間曾引起學人的極大關注，湯顯祖《孫鵬初遂初堂集序》記載，當時的湖湘學人孫羽侯（字鵬初）就曾發願編纂《儒藏》，其文云：「（鵬初）嘗欲總史傳，聚往略，起唐虞以來至勝國（元朝），效遷史體，爲紀傳之書；而因以檃括《十三經》疏義，訂覈收採，號曰《儒藏》。」（《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一〇）惜未成編。既而曹學佺亦有感於「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藏？」因此「欲修《儒藏》與鼎立」（《明史·曹學佺傳》）。曹氏《五經困學自序》也曾自述：「予蓋欲修《儒藏》焉，以經先之也。擷四庫之精華，與二氏爲鼎峙。」曹氏生平曾編撰成許多大型著述，可惜卻沒能留下《儒藏》的吉光片羽！清乾隆年間，山東學人周永年撰《儒藏說》一卷，推《儒藏》編纂爲「學中第一要事」，但也未付諸實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孔子的故鄉山東省，出版了大型儒學叢書《孔子文化大全》，這是一部力圖「比較全面地展示出孔子文化和儒家學說全貌」的叢書，編輯體例突破了傳統的「四部法」，「分爲經典、論著、史志、雜纂、藝文、述聞六類」著錄各書。前三類和第五類顯然繼承了傳統經、史、子、集

四部分類法，而又增加雜纂、述聞二類以濟四部之窮，顯示出不凡的變通和創新意識。但總共收書祇有一百零六種，是在「與儒家有關的著述不在數萬部之下」的群書之中，經過一番「去蕪取精」編纂而成的，數量十分有限。從內容上看，編者雖然立意「收錄孔子和歷代儒家代表人物的經典著作及古籍資料，古今學者論著及研究成果，未曾面世的珍貴文獻」等，但由於篇幅受限，編者祇能對孔子、曾子、顏回、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資料收錄較全，其他諸儒的著作和資料卻概未涉獵。顯然沒有達到集儒學文獻之大成、成儒學資料之全書，亦即儒學之「藏」的水準。

彙集儒家經學的、理論的和歷史的文獻，編纂出一套大型叢書；同時研究儒學文獻的類別，創立一套新型的適合儒學文獻的分類體系和著錄方法，仍然是擺在當今學人面前亟需完成的神聖使命。

三

《儒藏》是儒學之「藏」，它是儒家經學成果的集成，是儒家思想理論的薈萃，是儒學歷史文獻的總錄。二千五百年間的儒學歷史將在此得一大總結，此後的學者專家將從此方便地覓得儒學研究的資料。她是對儒學文獻的一次大搜討，是對儒學成就的一次大檢閱，也是對儒學歷史的一次大掃描。前於此的儒學發展史，將由此而得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式的疏通清理；後於此的儒學研究，亦將借此「即類求書，因書就學」，得到查閱資料的方便。對於前者，《儒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